

四川省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 魏红翎 著

成都尊经书院史

巴蜀书社

四川省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 魏红翎 著

成都尊经书院史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尊经书院史/魏红翎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11
ISBN 978-7-5531-0714-1

I. ①成… II. ①魏… III. ①书院—教育史—成都市
IV. ①G649.29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7980 号

成都尊经书院史

魏红翎 著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4.2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714-1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自序

2012年，我到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主要上一些国学课，这是成都大学的一门特色课程，它面向全校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期间我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西华大学有一份专辑《蜀学》，刊发的都是关于四川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和我的研究方向很契合，我便常常给他们投稿。由此也对四川学术的发展有了一些思考：谈到四川学术源头，文翁石室几乎家喻户晓；到了宋代，因为苏轼的影响，“蜀学”名声大振；而之后，尤其是有清一代，似乎非常沉寂，确实如此吗？在谢桃坊先生的推荐下，拜读了胡昭曦先生的《振兴近代蜀学的尊经书院》和龙晦先生的《王闿运和他的尊经书院的弟子们》，使我很受启发，感到眼前灵光一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不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吗？

这座清末建立于成都的尊经书院曾经有过如此的辉煌，对于四川乃至全国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同寻常的影响：从历史而言，它是对中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积极回应；从教育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桥梁；从学术而言，它是对文翁兴学的传承，是复兴蜀学的桥头堡；从政治而言，近代中国两次巨变，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成果而言，它所培养的学

生可以称之为群星璀璨。尊经书院当之无愧成为那个时代省级大型书院的标杆，实际上它也是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

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人对它却知之甚少。即便在学术界，也仅仅散见一些零星的文章，竟然连一部专著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叹息。相较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书院研究，四川确实还较为欠缺。正如胡昭曦先生所言：“四川地区书院的研究甚为薄弱，既缺乏系统整理，又缺乏细致考订；既很少微观钩沉，更未见宏观探讨，专门性的研究论述凤毛麟角。这当然影响到中国书院史的整体性、深入性研究，以至目前全国性的书院史论著对四川书院的状况或举例言之，或所据乏稽，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或概略而论。当然也影响到今天我们对书院这份重要历史遗产的全面认识、正确继承和准确借鉴。因此，有必要加强地域书院史的研究。”^①作为一个成都人，似乎也就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不揣浅陋，贸然闯了进去。

尊经书院涉及的人和事非常之复杂，从张之洞到丁宝桢，从王闿运到宋育仁，从杨锐到廖平……每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曾留下浓墨重彩的身影，如果不能透彻理解他们，很难准确还原书院那段精彩的历史。另外尊经书院存在的时间虽然仅有 27 年，但却经历了清末最为风云变幻的岁月，戊戌变法期间这里是四川维新派的大本营，与北京遥相呼应。之后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辛亥保路运动，其领导者多为书院的师生，这场运动也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可以说小小书院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沧桑、民族命运，它背后是极为宏大壮丽的社会画卷。书院在其中自觉成为了启迪民智民知的急

①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引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3 页。

先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对这些厚重历史的驾驭和把握，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更遑论书院所涉及的教学管理、制度设计、人事变迁、教学理念、书籍出版、弟子学生等诸方面的内容，可谓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前人的研究较少，资料非常欠缺，必须从头开始。

收集资料的历程是漫长而艰辛的。忘不了在成都市图书馆古籍室抄录书院学生课艺集的日子，尘封百年的线装书一册册翻开，那久远的历史扑面而来。就我目前所知，这应是对尊经书院课艺集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也忘不了在四川大学档案馆查阅尊经书院档案的情景，它们是当下唯一的留存了，非常珍贵。通过这次全面查阅，掌握了书院当时的经费收支等情况，特别是明确了书院所刻书版的目录、数量等具体信息，对于还原书院的历史全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四川大学校史馆也采集到不少资料，尤其是书院的创立者四川总督吴棠曾上书清廷详细奏报建院始末（即《奏为绅民请捐建尊经书院并刊刷经史以裨实学恭折仰祈》），然而翻遍各种典籍，均未见到这份奏章。后来发现它作为文物被陈列在四川大学校史馆的橱窗里进行展示，但是只能见局部不能见全貌，幸而得到校史馆馆长允许，将其取出查看。这份资料对于呈现建院初期的情况是极为宝贵而确凿的，本书也是迄今为止首次全文披露这份奏章的学术著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如果说本书对于尊经书院研究有一定贡献的话，恐怕主要就体现在资料的尽量全面、真实、准确、丰富上。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成都尊经书院。下面对它的情况进行一个简单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兴文县人侍郎薛焕率领四川乡绅十五人联名向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投牒请求在省城兴办书院，振兴蜀学。第二年（1875）春天，尊经书院落成，地址位于成都府

城南门文庙街西侧石犀寺附近，毗邻文翁石室（时为锦江书院）。该书院一改当时绝大多数书院以时文课士的教学道路，提倡致有用之学，要求院生博览群书，关心时政，同时严肃考风、学风，书院面貌焕然一新。

张之洞、王闿运等人为尊经书院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张之洞作为四川学政，不仅积极支持兴建书院，而且在建成后，直接参与了相关的制度建设，还亲自为院生授课，并且撰写《书目答问》、《輶轩语》，指导为学路径。张之洞一生办学无数，但单独为一座书院的学生撰写学习指导用书，这是唯一的一次。离别之际，他留下《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详细阐述办学宗旨、教学理念等等，实为当时书院的学规。而且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与书院弟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他们的发展，如他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诫廖平；戊戌变法失败后，闻知杨锐被捕，张氏连夜写信，愿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杨锐。王闿运作为山长，对院生的指导就更加全面、具体、深入，他是“湘学”的代表人物，学术造诣颇深，对于院生治学道路的影响极大。在王闿运的精心培育下，“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彬彬进乎礼乐。其后廖平治《公羊》、《穀梁春秋》、《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家法，未尝封于阮氏《经解》，视诂经、南菁、学海之徒曰：‘《经解》者，盖不可同日语。’蜀学成”^①。此外，宋育仁担任山长期间，尊经书院成为维新运动的基地，名扬省内外。

尊经书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02年，四川总督奎俊将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四川中西学堂合并，在尊经原址设立四川通省大

^①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1版，第4页。

学堂，同年12月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因此它前后存续不过27年。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却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其中载入《四川省志·人物志》的就有二十六位，堪称奇迹，包括“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离经叛道、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舍身炸死良弼，被孙中山先生授予大将军称号的彭家珍；领袖群伦、叱咤风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人物吴玉章、张澜、罗纶、蒲殿俊；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个状元骆成驤；‘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吴之英、张森楷、邵从恩、顾印愚和其他一大批社会名流”^①。这批从尊经书院走出的学生，成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力量，他们活跃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医学等众多领域，对四川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与进步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毫不夸张地说，尊经书院确实是教育界的一个奇迹。它对于扭转川省学风，打开省内学人眼界都功不可没，正是在它的带动和引领下，沉寂的蜀学开始复兴，天府大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它是当之无愧的四川思想文化复兴的引擎和源头。研究它对于揭示那段精彩纷呈却被淡忘的历史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特别是对理解四川清末的变迁以及教育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更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围绕尊经书院，详实具体论述了书院成立发展的历程，涉及其教学制度、教学理念、教学活动、各届山长、藏书刻书、学生成就、学术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尊经书院

^①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4页。

的历史。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谬误，在此恳切地期望各位尊敬的师友和读者不吝赐教。

成都大学 魏红翎

2016年1月17日，腊八，于锦城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尊经书院成立	(1)
第一节 建院缘起	(2)
第二节 筹建经过	(8)
第二章 尊经书院建制	(18)
第一节 建院目的	(19)
第二节 行政组织	(25)
第三节 经费开支	(29)
第四节 招生学籍	(39)
第五节 书院建筑	(42)
第三章 尊经书院的教学	(52)
第一节 书院学规	(53)
第二节 课程学习	(62)
第三节 考课奖惩	(113)
第四节 各届山长	(116)
第四章 张之洞与尊经书院	(128)

第一节	任四川学政	(129)
第二节	《辘轳语》	(157)
第三节	《书目答问》	(188)
第四节	影响及评价	(211)
第五章	王闿运与尊经书院	(218)
第一节	任书院山长	(220)
第二节	大力整顿院务	(227)
第三节	学术思想与教学理念	(230)
第四节	与弟子们的书院生活	(250)
第六章	伍肇龄、宋育仁与尊经书院	(263)
第一节	伍肇龄与尊经书院	(265)
第二节	宋育仁与尊经书院	(272)
第七章	尊经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303)
第一节	藏书情况	(304)
第二节	刻书工作	(312)
第八章	尊经书院的弟子	(351)
第一节	概述	(352)
第二节	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	(361)
第三节	弟子群英谱	(369)
第四节	尊经弟子与近代中国	(395)
第九章	尊经书院与蜀学复兴	(410)
结 论		(431)
参考文献		(437)
后 记		(446)

第一章 尊经书院成立

四川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享有天府之国的盛誉。战国时期，李冰父子率领民众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消除了岷江水患，自此水旱从人，蜀地不知饥馑。西汉文翁化蜀，蜀学比肩齐鲁。风调雨顺，较少战乱，经济富庶，百姓安乐，实为人杰地灵之所，英雄才俊代不乏人。汉之君平、相如、扬雄、王褒，唐之陈子昂、李太白，宋之三苏父子，明之杨升庵，均是享誉华夏之杰出人物，其作品往往成为那个时代的引领者和象征。蜀地学者殷殷向学，开创了以张栻、魏了翁为代表的蜀学传统，形成了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并驾齐驱之势。但是明末清初以后两百余年的时间，蜀学趋于凋敝，蜀地人才不兴，远远落后于江浙地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有识之士纷纷放眼看世界，思考国家民族出路，四川却依然万马齐喑，学人对外面的世界毫不关心、置若罔闻，整个学界仍然笼罩在封闭保守的风气之下，与时代的先进潮流越发脱离。究其原因，不能完全笼统地归于是战乱的因素。因为清军入关，特别是康熙乾隆朝以后，四川人口实际上大量恢复，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因而长达两个世纪蜀地文化落后于全国，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极不协

调实际另有原因。

正是忧虑于蜀地文化的颓败，后继无人，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乡绅十五人在兴文县人侍郎薛焕的率领之下，联名向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投牒请求在省城兴办书院，振兴蜀学。尊经书院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而它是诞生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特殊时期，它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四川的希望和理想，承担着复兴蜀学、重振学术的重任，并且它也终将见证科举时代结束、中国教育制度由传统书院走向近代化的全部过程。

第一节 建院缘起

明末清初的战乱令四川一片凋敝，“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频年进剿、迁移，仅存皮骨，今一二孑遗，衣食不能自给”^①，书院自然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自顺治十年（1653）起，清政府持续在四川推行招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人口、耕地数都大幅增加：全省人口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已达到 2566.5 万人，耕地则由顺治十八年（1661）的 119 万亩增至乾隆、嘉庆之时的 4600 余万亩^②。四川的农业生产一举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谕旨已指出：“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③浙江总督

① [清]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第 19 页。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1 版，第 9、60 页。

③ [清]雍正十年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十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41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21 页。

李卫也表示：“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①王庆云《石渠余纪》记载了这个转变过程：“各省惟湖广常有余粟，江西次之；及四川生聚开辟，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②

广大四川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巴蜀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天府之国”重新焕发了生机。相应的，战乱中被摧毁殆尽的书院也迎来了新生。清政府对书院的管理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早期，统治者是限制其发展的。顺治九年（1652）朝廷曾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讲求实践，不许别创书院。”^③康熙年间虽有所松动，但总体而言，书院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情况才开始改变，这年朝廷下旨：“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不仅开禁，而且在经费上给予支持，明确表示“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④。这种鼓励与支持大大激发了各地办学的热情。之后，乾隆沿袭了这项政策，继位元年便下诏：“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⑤诏书对书院讲席、学生的选择多有要求，对学规、课程、考核奖励等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并且还将书院的发展纳入学政的工作业绩加以考核：“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果教

① [清]雍正十年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②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邻谷协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91页。

③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志》卷七十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④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7、688页。

⑤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9页。

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①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影响之下，四川各地书院纷纷设立。据《四川书院史》统计，仅乾隆年间四川就设置书院 120 所。整个清代四川共建书院 552 所（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在全国 31 个省（市）的排名中居于第 2 位，名次之靠前是过去历代从未有过的^②。同治年间，四川书院的学生已达三万余人，颇为可观。

但是与经济的发展和书院数量的增加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清朝建立后两百余年间，四川地区人才匮乏的现状。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了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竟没有一个四川人。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是对清朝学术发展状况的大总结，收录的作品中也无川人踪迹。根据《清代四川进士征略》统计：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二百五十八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鸦片战争前约两百年的时间，四川考取进士的仅为四百余人，仅占全清进士的 1.6%^③。四川人杰地灵，文翁化蜀之后，蜀学蓬勃发展。汉之相如，唐之青莲，宋之东坡，明之升庵，代不乏人。清朝前半期出现这种状况，就殊为奇怪，究其缘由，实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首先，学子学习的方向不明，难以造就人才。清廷前期的文教政策极其严苛，“文字狱”更令世人风声鹤唳，虽然之后政策放松，但心理阴影依然难以消弭，学人谨小慎微、亦步亦趋。虽然解禁书院，提倡办学，但朝廷意在笼络士人，以科举为业，“读书应举”，

① [清] 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63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99 页。

②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第 207 页。

③ 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 版，第 3、6 页。

从而“屏去浮器奔竞之习”，“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①。

在此政策之下，书院讲学、学子求学之目的惟在举业。嘉定府《九峰书院条规》记载：“国家以制艺取士子，八股一道首宜讲求。”^②曾担任锦江、尊经书院山长的伍肇龄在《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序》中也认为：“国朝初，建锦江书院，大抵惟科举是务。”^③这实际是当时的普遍风气，“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举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④。民国时《西昌县志》卷七明确指出：“清代书院林立，延聘硕学鸿儒长院。学子寄宿其中，有膏火之资，故能安心求学。然因科举取士，学者所志，多在举业耳。”^⑤

而一旦走上此路，学子必须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若干复杂漫长的考试过程，最终进入仕途。每级考试程序繁琐，科目众多，但其试题均以“四书五经”为旨归，且必须以朱熹集注、前人注疏为圭臬，不可越雷池半步。并且文体要求采用“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每段又要遵守固定格式，致使文章徒求形式，却内容空洞。这时的科举考试显然已经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一些腐儒陷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皓首穷经的道路中。有识之士对之忧心忡忡，张之洞便不无忧虑地感叹：“今世

① [清] 乾隆五年敕编：《世宗宪皇帝圣训》卷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② [清] 宋鸣琦纂修：同治《嘉定府志》卷四十五文，清同治三年刻本，第81页。

③ [清] 伍肇龄辑：《尊经书院二集》，成都：尊经书局，光绪十七年刻本，第1页。

④ [清] 刘开：《贵齿论》，《刘孟涂集》文集卷二，清道光六年姚氏槧山草堂刻本。

⑤ 民国《西昌县志》卷七教育志，民国三十年，第1页。

士人殚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治政戡乱之略哉？”^①

四川的情形正是如此，学子终其一生，所知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甚至根本不知道有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连清朝兴盛的乾嘉之学都毫不知晓，更遑论国家社会民生等现实问题。“（蜀士）习尚浮薄，专以时文贴括苟取科名为事，凡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多束而不观，间有响学者，亦苦无师资，茫然不得其途径。”^② 廖宗泽《六译先生行述》：“文襄未来时，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③ 视野狭窄，盲目又闭塞，使川内学界如死水一潭，毫无建树。

其次，学风涣散，弊病甚多，影响恶劣。以当时的省城书院锦江书院为例，咸丰年间，“住院诸生竟有不谒见山长者，何以受耳提面命之益？且来去自由，并不通知监院，日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友朋，往来住宿，视（书院）作旅寓”^④。其松散懈怠的情形可见一斑，且考试时“冒名代替”、“剿袭雷同”也屡见不鲜，“流弊较前尤甚”，致使四川省盐茶道、成都府正堂、四川布政使、四川按察使、成绵龙茂道共同签署颁布《改定课规十条》，严厉要求“务各湔除积习，恪守定规”^⑤，力度之大从一个侧面也体

① [清]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版，第744页。

② [清]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下，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版，第15页。

③ 廖宗泽：《六译先生行述》，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85页。

④ [清] 李承熙编撰：咸丰七年《示谕》，《锦江书院纪略》下册，成都：锦江书院刻印，第36页。

⑤ [清] 李承熙编撰：咸丰八年《改定课规十条》，《锦江书院纪略》下册，成都：锦江书院刻印，第60—61页。